

# 凝视与记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蒙古地区早期摄影的影像叙事与文化记忆建构

高珊

大连民族大学，辽宁大连

DOI:10.62836/ssr.v3n2.1139

**摘要：**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欧俄探险家和学者携带摄影器材进入蒙古高原，一批系统性的视觉档案由此形成。本文以乔尔·埃里克森（Joel Eriksson）的乌普萨拉Alvin档案（1913—1948）、科兹洛夫（П. К. 科兹洛夫）1905年记录的达赖喇嘛系列影像，以及布尔杜科夫（А. В. 布尔杜科夫）的图文记录为核心案例，考察这三组跨机构、跨国别的早期影像档案如何通过选题框架、分类逻辑与传播路径，在外来凝视与本土文化之间生成一种特定的文化记忆建构机制。研究发现：早期蒙古影像叙事在宗教场景、游牧物质文化和政治事件三个维度上形成了差异化的记忆固化策略；摄影媒介的“凝固性”与游牧社会的流动性本体之间存在结构性张力，而这一张力本身即是理解这批影像历史价值的关键切入点；回顾性民族志方法（Retrospective Ethnography）为重新激活这批“无活态对话者”的沉默档案提供了可行的方法论路径。

**关键词：**早期摄影；蒙古地区；影像叙事；文化记忆；回顾性民族志

---

## Gazing and Memory: The Image Narratives and Cultural Memory Construction of Early Photography in the Mongolian Region from the Late 19th Century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Shan Gao

Dailian Minzu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Abstract:** From the late 19th century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s European and Russian explorers and scholars brought photographic equipment to the Mongolian Plateau, a series of systematic visual archives were formed. This paper takes the Uppsala Alvin Archive of Joel Eriksson (1913-1948), the Dalai Lama series of images by Kozlov (П.К. Козлов) in 1905, and the graphic records by Burdukov (А.В. Бурдуков) as core cases to examine how these three sets of cross-institutional and cross-national early photographic archives, through their thematic frameworks,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俄藏《卫拉特法典》诸本整理、翻译及与中华法系价值比较研究”（批准号：25&ZD24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高珊（1990-），女，汉，河南，硕士，研究方向：纪录片，艺术类，电影、媒体、视觉、设计，影视人类学社科类，电影制作类。

classification logics, and dissemination paths, generate a specific cultural memory construction mechanism between external gaze and local culture.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early Mongolian image narratives have formed differentiated memory solidification strategies in three dimensions: religious scenes, nomadic materi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events; the “fixity” of the photographic medium and the fluidity of the nomadic society have a structural tension, and this tension itself is the key entry point for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these images; the retrospective ethnography method provides a feasible methodological path for reactivating these “silent archives” of “inactive interlocutors”.

**Keywords:** Early Photography; Mongolian Region; Image Narratives; Cultural Memory; Retrospective Ethnography

## 1 引言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伴随欧洲与俄国在中亚、蒙古高原的地理探察活动，摄影技术作为科学考察的辅助工具被系统引入该地区。与同期非洲、南亚殖民地的影像生产不同，针对蒙古地区的早期摄影并非单一殖民政权主导的系统工程，而是由俄国学者、北欧探险家、传教士及军事测量人员共同参与的分散性视觉实践。这一特殊性使得蒙古早期影像档案在跨机构性、多视角性方面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

然而，学界对这批档案的关注长期停留在史料层面——作为文字史料的补充或图像插图。从影像叙事与文化记忆建构的维度展开系统分析，目前仍较为薄弱。这一空白并非偶然：其一，相关档案分散于乌普萨拉大学、俄罗斯地理学会、赫尔辛基大学等多处机构，整合难度较大；其二，传统民族志研究依赖“活态田野”，而这批影像的拍摄者与被摄对象均已离世，无从开展常规意义上的访谈与参与观察。

本文采用“回顾性民族志”（Retrospective Ethnography）作为方法论框架，以三组核心档案为案例：乔尔·埃里克森（Joel Eriksson）收藏于乌普萨拉大学Alvin数据库的蒙古地区田野照片（主体年代为1913—1948年）；俄国探险家科兹

洛夫（И. К. 科兹洛夫）1905年中亚考察中拍摄的达赖喇嘛及西藏—蒙古宗教网络系列影像；以及商人兼业余民族志学者布尔杜科夫（А. В. 布尔杜科夫）留存的祝福仪式记述与相关图像。通过对三组档案在叙事框架、影像分类逻辑和历史传播路径上的比较分析，本文尝试回答以下核心问题：这批早期影像档案究竟建构了何种蒙古文化记忆？这种建构机制的内在逻辑与结构性限制是什么？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 2.1 影像与记忆研究的理论谱系

从理论资源来看，本文主要援引三个层次的学术积累。其一是摄影的本体论讨论。巴特（Roland Barthes）在《明室》（1980）中将摄影的核心特质界定为“此曾在”（ça-a-été）——影像对已逝时刻的不可辩驳的证明功能[1]。桑塔格（Susan Sontag）则在《论摄影》（1977）中进一步揭示了摄影作为现实切片的双重性：既是记录又是诠释，既保存又简化[2]。这两种论述共同指向摄影影像的“凝固性”，而这一属性与游牧社会以流动为根本存在方式之间，构成了本文分析的核心张力。

其二是视觉人类学与民族志影像的方法论讨论。爱德华兹（Elizabeth Edwards）在多项研究中

系统考察了殖民地背景下的民族志摄影，揭示外来摄影者如何通过特定的视觉语法将“他者”固定为可认知的文化客体[3]。平尼（Christopher Pinney）对印度殖民地摄影的研究则提示，被摄者并非完全被动，摄影现场存在复杂的协商与抵抗[4]。这些研究为分析蒙古地区早期影像中的权力关系提供了参照。

其三是文化记忆理论。扬·阿斯曼（Jan Assmann）与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将文化记忆界定为超越个体生命周期、依托媒介与仪式得以传承的集体记忆形式[5,6]。早期摄影作为记忆媒介，在蒙古文化记忆的跨代际传递中扮演了特殊角色——尤其是在20世纪政治剧变导致大量物质文化遗产遭到破坏的背景下，这批影像的记忆载体功能显得更为突出。

## 2.2 回顾性民族志的方法论定位

本文提出的“回顾性民族志”（Retrospective Ethnography）并非对已有方法的简单重述。它与阿尔梅达（Almeida）的“档案民族志”及桑德伯格（Sandberg）的“历史民族志”的主要区别在于：后两者通常仍可援引文献中有呼应的活态文化实践或存世的知情人证词，而回顾性民族志面对的是一个“无活态对话者”的纯粹档案情境——拍摄者、被摄者以及最初的解读者均已离世，田野本身只能通过影像与文字的“逆向辨认”加以重构。这一方法论立场要求研究者对影像的再诠释保持必要的认识论谦逊，同时系统利用跨档案比对、多语种文献互证等手段，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语境。

## 3 三组档案的影像叙事分析

### 3.1 埃里克森/乌普萨拉Alvin档案：分类逻辑与系统性凝视

乔尔·埃里克森（Joel Eriksson）档案现藏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Alvin数字平台，收录蒙古地区田野照片逾千幅，时间跨度覆盖1913至1948年。从影像的分类逻辑来看，该档案呈现出明显的类型学倾向：器物类（蒙古包结构、毡制品、马

具）、人物类（按性别、年龄、身份区分）、仪式类（佛教法会、萨满仪式）与地景类（草原、山地、河流）四大类别界定清晰，内部排列遵循近似博物学的系统性原则。这种分类框架本身即是一种叙事行为——它将流动的游牧生活切割为可分类的静态单元，并隐含一种“文化整体性”的预设：仿佛透过这批照片，即可获得关于“蒙古文化”的完整知识。

然而，系统比对瑞典文原始说明文字与影像内容后可以发现，相当数量的标注存在文化误读或简化处理。部分标注将地域性差异（如喀尔喀蒙古与内蒙古各地区的习俗差异）统一归并为“蒙古人的传统”，从而抹去了族群内部的多样性。这种叙事简化在无意中强化了一个同质化的“蒙古文化”形象，并在此后的学术引用与博物馆展陈中形成路径依赖。

从文化记忆建构的角度看，埃里克森档案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视觉史料，尤其是在20世纪中叶政治运动导致大量寺庙和传统器物被毁后，这批影像成为重建物质文化谱系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其内在的类型学叙事框架也持续塑造着学界和公众对于“传统蒙古”的想象，部分遮蔽了这一文化的历史动态性[7]。

### 3.2 科兹洛夫1905年影像：政治事件中的宗教凝视

俄国探险家彼得·科兹洛夫（П.К.科兹洛夫）1905年赴蒙古库伦记录并拍摄了一批涉及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影像。此时，达赖喇嘛因英国荣赫鹏远征军入侵拉萨而被迫出走，辗转经蒙古抵达库伦（今乌兰巴托），这一政治流亡事件在科兹洛夫的镜头下获得了明确的视觉叙述。

科兹洛夫的影像选题具有高度的战略意识：在俄英两国围绕中亚展开“大博弈”（The Great Game）的历史背景下，达赖喇嘛在蒙古的出现不仅是宗教事件，更是地缘政治事件。科兹洛夫的拍摄行为本身即服务于俄国对藏蒙宗教网络的情报收集与政治经营需要。然而，这批影像在后续

流传中逐渐剥离了其政治生产语境，被重新定性为“宗教民族志影像”，进入博物馆与学术出版物的中性化叙事框架。

这一转化过程是理解早期民族志影像如何建构文化记忆的关键案例。影像的政治起源被遗忘，而其宗教与民俗内容被保留并放大，从而在蒙古藏传佛教的文化记忆谱系中占据了一个看似“客观”的历史见证位置。从阿斯基曼的文化记忆理论视角来看，这恰恰是记忆媒介从“交际记忆”（communicative memory）向“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转化的典型机制——随着时间流逝，生产语境淡出，影像本身成为文化记忆的自载体。

### 3.3 布尔杜科夫记录：文字与影像的互证叙事

亚历山大·布尔杜科夫（А. В. Булдуков）是一位长期活跃于蒙古地区的俄国商人，同时具有业余民族志学者的身份。他留存的文字记述与配套影像呈现出一种不同于职业学者的叙事特质：记录对象侧重日常生活的细节——祝福仪式（адислал/adislan）的程序与参与者互动、帐篷内的器物摆放逻辑、季节性迁徙的具体组织方式。

布尔杜科夫记录的独特价值在于其“局内人视角”的相对性：与系统受过学术训练的探险家不同，他对记录对象持有一种更为日常化、非类型学的兴趣。这使得他的文字描述与影像之间形成了一种较为紧密的互证关系——文字说明不是对影像的简单重复，而是补充了影像无法呈现的时序信息、参与者关系与文化阐释。这种图文互证的叙事结构，为后来的回顾性民族志研究提供了比单纯影像档案更为丰富的分析界面。

从文化记忆建构的视角来看，布尔杜科夫记录的影响路径有别于前两组档案：它不是通过博物馆展陈或学术专著的正式渠道进入公共记忆，而是以“灰色文献”的形式在俄国学术圈内小范围流传，并在20世纪后半叶的蒙古学研究中被重新发现。这一传播特点使其记忆建构功能长期处于潜

伏状态，也意味着其所承载的日常生活细节——相对于宗教与政治事件而言——在蒙古文化公共记忆中的能见度仍然偏低。

## 4 影像凝固性与游牧流动性的本体论张力

综合以上三组案例，可以提炼出一个贯穿早期蒙古影像档案的结构矛盾：摄影作为一种以凝固瞬间为前提的媒介技术，与游牧社会以流动为根本存在方式之间，存在深层的本体论张力。

在时间维度上，这一张力已由巴特的“此曾在”论述充分揭示；但在空间维度上，它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而后者在既有文献中尚未获得充分讨论[8,9]。游牧社会的空间逻辑是非固定的、季节性的、网络状的：营地的选址依水草而变，牧场的边界随季节而移动，宗教朝圣的路线跨越数千公里。而摄影的取景框将这种空间流动性压缩为一个固定的地点坐标——某张照片不仅凝固了时间上的某个瞬间，同时也将空间上的某个临时聚集定格为“典型场景”。埃里克森档案中的蒙古包照片、科兹洛夫拍摄的寺庙建筑、布尔杜科夫记录的仪式现场，无一例外都在以这种方式将本质上是流动性的文化实践转译为静态的视觉文本。

这一本体论张力并不意味着早期蒙古影像档案因此失去学术价值；恰恰相反，认识到这一张力，正是充分挖掘其价值的前提。只有意识到每一张影像都是游牧生活时空连续体上的一个强行切片，研究者才能在使用这批档案时保持必要的方法论自觉：将影像视为“时空切片”而非“文化缩影”，在逆向辨认的过程中不断检验自身诠释的局限性。

从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瓜塔里（Félix Guattari）的游牧哲学视角来看，这种张力还具有更深刻的含义：光滑空间（smooth space）与条纹空间（striated space）之间的对立，在摄影的影像生产中获得了具体的视觉表征——摄影的取景框本身就是一种“条纹化”操作，它将无边际的游牧时空划定边界、赋予坐标、纳入可管理的视觉秩

序。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早期蒙古影像档案在殖民知识生产中的位置，以及其文化记忆建构功能的内在限制。

## 5 结论

本文通过对埃里克森/Alvin档案、科兹洛夫1905年影像及布尔杜科夫图文记录的比较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早期蒙古影像档案的文化记忆建构功能并非中性或透明的，而是深刻受制于生产语境——摄影者的身份立场、考察目的与机构归属，共同塑造了影像的叙事框架与分类逻辑，并通过档案的传播路径持续影响后世的历史诠释[10,11]。

第二，三组档案在宗教场景、游牧物质文化和政治事件三个维度上呈现出差异化的记忆固化策略。科兹洛夫影像的政治起源在后续传播中被系统性淡化，最终以宗教民族志的面目进入公共记忆；埃里克森档案的类型学分类逻辑则在提供系统史料的同时，强化了同质化的“蒙古文化”想象；布尔杜科夫记录因传播路径的局限，其所承载的日常生活细节在公共记忆中的能见度仍有待提升[12-15]。

第三，摄影的凝固性与游牧流动性之间的本体论张力，不仅是理解这批影像局限性的解释框架，同时也是理解其历史价值的正面切入点：正因为这批影像强行切入了游牧生活的时空连续体，并以“时空切片”的形式将其保存下来，才在物质文化遭受大规模破坏的历史背景下，成为不可替代的文化记忆载体。

第四，“回顾性民族志”方法论为重新激活这批沉默档案提供了可行路径。其核心要义在于：以认识论谦逊为前提，通过跨档案比对与多语种文献互证，在“无活态对话者”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语境，并对诠释的边界保持持续的自我反思。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受制于篇幅，本文对三组档案的分析深度有所取舍；此外，蒙古文原始文献的引入将进一步丰富分析的内在视角，这有待后续研究加以补充。

## 参考文献

- [1] Barthes, R. (1980). *La Chambre Claire: Note sur la photographie*. Paris: Gallimard/Seuil. [中译本：罗兰·巴特著，赵克非译：《明室：摄影札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
- [2] Sontag, S. (1977). *On Photograph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中译本：苏珊·桑塔格著，艾红华、毛建雄译：《论摄影》，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
- [3] Edwards, E. (2001). *Raw Histories: Photographs, Anthropology and Museums*. Oxford: Berg.
- [4] Pinney, C. (1997). *Camera Indica: The Social Life of Indian Photograph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5] Assmann, J. (1992). *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ä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 Munich: C.H. Beck. [中译本：扬·阿斯曼著，金寿福、黄晓晨译：《文化记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 [6] Assmann, A. (1999). *Erinnerungsräume: Formen und Wandlungen des kulturellen Gedächtnisses*. Munich: C.H. Beck.
- [7] Khazanov, A.M. (1984).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8] Deleuze, G. & Guattari, F. (1980). *Mille Plateaux*. Paris: Minuit. [中译本：德勒兹、瓜塔里著，姜宇辉译：《千高原》，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
- [9] Ingold, T. (2007). *Lines: A Brief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 [10] Uppsala University Alvin Digital Archive. Joel Eriksson Collection. <https://www.alvin-portal.org> (访问日期：2025年)
- [11] Козлов, П.К. (1905). *Монголия и Кам: трёхлетнее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о Монголии и Тибету*.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Русско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科兹洛夫：《蒙古与康区：穿越蒙古与西藏三年游记》，圣彼得堡：俄国地理学会，1905年。]
- [12] Munkherdene G. *Mongolyn Ugsaatny zuin Udirtgal* [An Introduction to an Ethnography of Mongolia], written by Nyambuu Khand[J]. *Inner Asia*, 2016, 18(2):342-342.
- [13] Pinney, C. & Peterson, N. (Eds.) (2003). *Photography's*

Other Histor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Chicago Press.

[14] Ryan, J.R. (1997). *Picturing Empire: Photography and the Visualiza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15] 那木吉拉: 《蒙古族萨满教研究》,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年。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Global Science Publishing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